

海因里希·希姆莱  
与妻书信集  
1927-1945

【德】米卡尔·维尔特 卡特琳·希姆莱 著  
陈伟 译



Heinrich  
Himmler  
d'après  
sa correspondance  
avec sa femme  
1927-1945

Michael Wildt  
Katrin Himmler

# 海因里希·希姆莱 与妻书信集 1927-1945

【德】米卡尔·维尔特 卡特琳·希姆莱 著

陈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 1927-1945/(德)维尔特,(德)希姆莱著;陈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21-5158-5

I. ①海… II. ①维…②希…③陈… III. ①德国党卫军-史料  
IV. ①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6290 号

© Éditions Plon, un département d'Édi8,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秦 静  
装帧设计: 姚 荣

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 1927-1945

(德)维尔特 (德)希姆莱 著  
陈 伟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970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58-5/K·354 定价: 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 前 言

1945年春，二战刚结束，一名美军情报官在特格尔恩湖附近的格蒙德镇遇见两名美国大兵，后者似乎刚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私人住所“林登菲希特庄园”发了一笔“纪念品”横财。情报官是位历史学家，他立刻意识到两个大兵身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便提出收购这些新发现的“纪念品”。两名大兵中的一个同意出售。于是情报官获得了一个装有希姆莱家庭私人文件的档案袋，其中包括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写于1914至1922年间的日记手稿。而另一名大兵却不愿出售他的珍宝，继续赶他的路去了。

情报官将这些日记寄回了美国，此后就束之高阁。1957年，他在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突然想起了它们的存在。这位朋友名叫维纳·汤姆·安格莱斯，是一位犹太裔德国历史学家。情报官把日记送给了他，供他研究。安格莱斯在一位名叫布莱德利·F·史密斯的年轻同事的帮助下，将日记手稿抄录了下来，并且以两人的名义，在1959年的《现代历史》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们的发现。<sup>①</sup>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版本，所以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

<sup>①</sup> 维纳·汤姆·安格莱斯 (Werner Tom Angress, 1920-2010) 经常谈起这段往事，对此他在和布莱德利·F·史密斯 (Bradley F. Smith) 合作的一篇文章中做了简短描述。论文题目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早年日记》« Diaries of Heinrich Himmler's Early Years » (《现代历史》杂志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第31卷, 第3期, 1959年9月)。关于维纳·汤姆·安格莱斯, 见其回忆录:《……外面总有什么东西。一个柏林犹太人的回忆录, 1920-1945》(*… immer etwas abseits. Jugenderinnerungen eines jüdischen Berliners, 1920-1945*), 柏林, 2005年。

两名美国大兵至今也无从寻找。后来，安格莱斯把这些日记连同其他文件，一起捐献给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后者将其公之于世。多年来，这批包括了玛佳·希姆莱致其丈夫信件的“希姆莱珍藏”，一直是传记作者们竞相挖掘的金矿。1995年，经过多年谈判，德国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向胡佛研究所买下了日记的原件，如今它们被保存在档案馆内，属于“希姆莱遗物”的一部分。

1980年代初，以色列发现了希姆莱家庭的另一批私人文件，它们无疑是第二名美国大兵带走的“纪念品”。这批文件包括约700封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27至1945年间写给他妻子的书信，全部都以微缩胶卷的形式保存着，另外还有玛佳·希姆莱1937至1945年间所写日记的微缩胶卷，这些文件的原件现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这批在以色列被发现的文件当中，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颁发给玛佳·希姆莱的党证原件、她写于1909至1916年间的年轻时代日记、一本关于女儿古德仁童年生活的日记、一本诗集、古德仁写于1941到1945年间的少女时代日记、玛佳记录家庭开支、圣诞礼物和个人收入的账本、希特勒青年团颁发给格哈德·冯·代尔·阿艾的证书和证件——后者在1933年4岁的时候被希姆莱夫妇收养<sup>①</sup>——，以及很多或散乱、或黏贴在相册里的私人照片。

这些文件是如何辗转至以色列的，我们无从查考。长期以来，拥有这些文件的是一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他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说，是在比利时的一个跳蚤市场发现它们的，后来他又换了说法，称是向希姆莱一位在墨西哥的朋友——卡尔·沃尔夫买来的，然后就一直保存在家里。曾经有一位以色列导演想利用这些文件，拍摄一部有关希姆莱的电影，但由于他英年早逝，所以没能拍成。有一段时间，这批文件据说要卖给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为此，该档案馆在1982至1983

---

<sup>①</sup>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此书中称其为“养子”，尽管这一称呼并不完全符合实情，因为玛佳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夫妇一直和格哈德的母亲保持着往来。

年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鉴定，包括对文件的材料进行检测，以便识别其真伪。鉴定结果毫无疑问。虽然希姆莱的书信原件无法得到，但凭借书信的笔迹以及它们和玛佳·希姆莱所写书信在时间和内容上的契合程度，可以明白无误地确认它们的真实性<sup>①</sup>。

如今，所有这些文件都在以色列的一位名叫瓦内萨·拉帕的档案员手中，她使用这些文件拍摄了一部影片，名为《正派人》，在2014年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由此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这些文件<sup>②</sup>。

正是这两大来源，使我们拥有了关于海因里希·希姆莱私人文件的丰富资料，这是任何一个纳粹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既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留下有关他私人的只言片语；赫尔曼·戈林是1945至1946年出现在纽伦堡审判庭被告席上职位最高的纳粹领导人，他只是在第三帝国的官方文件中留下了文字；约瑟夫·戈培尔虽然有洋洋洒洒长达几千页的狂人日记，但反映的是他作为纳粹显要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为的是供他日后出版所用；和他们相比，海因里希·希姆莱留给后人的，的确是一笔前所未有的财产。人类历史上种族屠杀的最大刽子手之一，竟然是留下私人文件最多的纳粹罪犯。

迄今为止，海因里希·希姆莱致他妻子玛佳的信件从未公开发表过，这些信和玛佳的回信相互补充，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书信往来，时间跨度从1927年两人初识到1945年二战结束。早期的书信看似异常乏味；1927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男人将会成为大屠杀的元凶：一个是纳粹党员，一个是离过婚的护士，两个平淡无奇的人在1920年代末相识，他们在无数书信中互表衷肠；然后他们结了婚，住在乡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然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又接受了一个寄养的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丈夫总是在外出差，妻子则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照看孩

---

<sup>①</sup> 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鉴定，历史-Z III 2-421/希姆莱，档案馆馆长，约瑟夫·亨克（Josef Henke）博士，1984年3月12日。此前，在发表于1984年2月18日的另一篇文章中，亨克博士再次确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些保存在特拉维夫的档案，其真实性没有任何疑问。”

<sup>②</sup> 文件的原件在特拉维夫；电影完成之后，瓦内萨·拉帕（Vanessa Lapa）将会把它们归还给档案馆，以便后者按规定进行清点，并向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人员进行开放。

子，打理属于他们的小农庄。时光流逝，信的内容越来越简单，丈夫公务繁忙，夫妻两人交流各自的日常烦恼，几乎每天互通电话，即使他很久以前就有了一个情妇，而且和她生了孩子。在这些信件中，战争似乎只是一个影子；玛佳描述柏林的空袭之夜，海因里希则告诉她说自己在东线战场有“很多工作”。当他们意识到战争失败的时候，信件往来也以一封诀别书而收场。

尽管这些描述并不动人，但仔细琢磨之余，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书信往来，发现海因里希和玛佳这对夫妇对自己、对世界的共同看法和观点。这些书信一点都不平庸和乏味。甚至，随着希姆莱的小布尔乔亚日常生活趋向暴力和无情，杀人的现实和个人田园爱情之间的鸿沟也日渐缩小。

### ☆☆☆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在慕尼黑，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老二，父亲戈培哈特·希姆莱是一名中学教师，母亲名叫安娜。海因里希和他的哥哥戈培哈特、弟弟恩斯特<sup>①</sup>一起，在一个布尔乔亚的环境中长大，不愁吃不愁穿。三个男孩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基本教育，非常强调服从和责任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海因里希成为军官的梦想破灭，只好去学习农艺，此后他投身于民粹主义运动，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说家。1929年，他获得“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头衔；1930年，当上了国会议员。1936年，纳粹上台后，他开始执掌全德国警察的指挥权；他是欧洲犹太人恐怖、迫害和屠杀事件元凶。1939年，他被任命为“德国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负责制定在东欧和西欧实施大规模流放和屠杀的计划。二战结束前，即1943年，

---

<sup>①</sup>海因里希·希姆莱父亲的全名是约瑟夫·戈培哈特·希姆莱，俗称“老戈培哈特”；其后的全名是戈培哈特·卢德温·希姆莱，俗称“小戈培哈特”；其弟的全名是恩斯特·赫尔曼·希姆莱。——译者注

他晋升为帝国内政部长；1944年，他被授予帝国军队预备队总司令的职务。他被捕后，于1945年5月23日自杀身亡。

玛佳莉特·希格洛特 1893年9月9日出生于波美拉尼亚靠近布洛姆贝格（比得哥什）一个名叫贡察泽维的村庄，父亲汉斯·波登，是一名地主，母亲名叫埃尔弗里德。玛佳莉特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她本人接受过护士培训，曾在军队医院工作。她于1920年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1923年，她在柏林的一家私人诊所里担任护士长，因为父亲的关系，她也持有诊所的股份。玛佳莉特和希姆莱结婚后，于1928年加入了纳粹党，1929年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古德仁；从1933年起，她又开始照料他们的“养子”格哈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佳·希姆莱在柏林担任德国红十字会的“高级领导”，并以此身份往返于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之间。战后，她和古德仁一起遭到囚禁；再后来她曾生活在比勒费尔德和慕尼黑的女儿家，并于1967年8月25日死于慕尼黑。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玛佳莉特·希格洛特相识于1927年9月18日，当时两人都在从贝希特斯加登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玛佳去贝希特斯加登是度假，而海因里希则是去出差。玛佳金发碧眼，非常符合海因里希·希姆莱理想中女性的体貌要求。除此之外，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拒绝民主，憎恨“柏林体制”，反犹（“犹太人帮”），蔑视人类（他俩在信件往来中曾经说：“人是多么虚伪和恶劣”）。此后不久，两人就开始一同向往在乡村生活了——不仅仅是为了通过饲养家畜、种植蔬菜等自给自足的生产，贴补希姆莱从纳粹党那里获得的微薄薪酬，也是为了响应国粹主义运动所提倡的“回归土地”的理想。他俩希望共同建立“美丽而干净的家”，同时也是一座“安全的城堡”，他们梦想在那里远离“肮脏”。

不过，令人惊讶的，却是那些我们在早期书信中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无论是海因里希还是玛佳，都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兴趣，相互之间也不询问关于日常生活、家庭、过去或者愿望等问题；有时，他们会提



到一些“很有趣的”经历或谈话，但事实上却看不到任何明显“有趣”的地方——总之，两人根本没有好奇心或情感的共鸣。他们之间的爱情，是靠刻板庸俗的套话、无休止的啰嗦，以及没有分寸且自我中心的要求（“不要忘记，接下去你将只属于我一个人”）表达出来的。在他俩看来，收到对方的书信，比书信本身一成不变的内容更加重要，而恰恰是这一成不变的内容才使他们情投意合。有时，他们也会对这样的情投意合感到怀疑，但这种怀疑又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不符合他们赖以成长的狭小世界（“我们的意见无疑是一致的，否则怎么可能想象呢”）。两人都说不出彼此爱慕的原因。他们的情感，最多以几句甜言蜜语来表达（“你用这么多的恩和爱来宠我”），而在他们婚前为数不多的几次碰面时，两人都带着字谜报纸，以防无聊的尴尬。

这些书信清晰地表明，在那些年里，希姆莱是如何顽固地按照自己的信念和世界观生活、行事的：从1924年开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纳粹运动获得成功。他不知疲倦地发挥自己的口才，卓有成效地在整个德国建立起纳粹的机构和网络。他绝对不是一个小党派中不起眼的秘书、永远受金钱的困扰、只是在1933年以后才突然发迹。相反，我们看到，早在1920年代，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就有多么重要，而他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又有多么亲密：希姆莱经常组织有希特勒演讲的活动，并且和他一起旅行（“我和元首明天出发”）；此外，他多年来长期担任纳粹的发言人，作为科班出身的农艺师，还负责领导农村地区的变革——这些地区对于纳粹而言太重要了。与此同时，他还亲临现场，建设冲锋队和党卫队部队，进而建立起众多的机构和网络；正是依靠它们，他才在1933年以后架设起了一个由党卫队、警察和盖世太保构成的、强大的恐怖机器。

他喜欢用“战斗”这个浪漫的名词称呼他的工作，在给玛佳的信中，他还自称“老兵”，以区别于“无聊的小布尔乔亚”的办公室日常工作。这些书信往来的持续时间之长，提到未来纳粹领导人的时间之早，都说明希姆莱在混迹于他同类之间的那些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说明

和这些“老同志”的长期接触，后来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希姆莱多年来在纳粹运动内部经营的小团体非常紧密：早在他结婚之前，就几乎只和纳粹思想的赞同者有私人往来；当他按计划回到农村之后，也只是按照自己在演讲中所宣扬的方式、所追求的目标而生活；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的生活目标就是以纳粹主义组织——“阿塔曼联盟<sup>①</sup>”——成员的身份去斗争。

同样，玛佳·希姆莱也不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妻子。她一结婚，就立刻参加了慕尼黑附近沃尔特鲁德灵的纳粹支部。而和希姆莱夫妇保持着深厚友谊的，也是从魏玛时代起就已经是坚定的纳粹分子的夫妇们。婚后不久，玛佳自豪地告诉丈夫，他家是“所有纳粹党员的聚会场所”。

在家里，玛佳兴致勃勃地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多想有朝一日去参加所有这些大型集会啊”）；1928年起，她定期阅读纳粹党报《民族观察家报》，甚至连家里的佣人都是在这份极右报纸的广告宣传栏里找的。有几次，她还说服了海因里希带上她一起出差。

早在纳粹上台前好几年，希姆莱夫妇就已经几乎只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交往了：他们蔑视民主，反犹排犹，誓言通过“战斗”获取“纳粹运动”的胜利，同时也对自己的天赋之才坚信不疑。

他俩结婚头几年的书信非常简朴，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无外乎对事件和名字的列举，空洞而没有意义。然而，我们看得出玛佳深受丈夫不在身边之苦。希姆莱很少有时间照顾他们的农场。他在从德国各地寄来的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的不舍之情，后者在怀孕、照顾幼儿的同时，还不得不自己动手，完成繁重艰难的农活。但与此同时，他远离妻子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无可非议——更何况自1930年起，他担任了国会议员，不仅需要经常去柏林，而且因为他在任期间可享受免费火车旅行，所以有更多人邀请他去演讲。

1933年到1940年，玛佳只留下几封信，而海因里希·希姆莱则一

---

<sup>①</sup>1923年成立于慕尼黑的极右翼青年组织，其成员自称“阿塔曼纳”。——译者注

封都没有。他那时担任着德国警察、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领袖；他们一家在格蒙德镇买下了“林登菲希特庄园”，同时在柏林有一处官邸，1937年起，官邸坐落在柏林达莱姆区的多南斯泰格公馆。关于希姆莱夫妇在那段时期的私人物品，我们手头只有玛佳所记的有关女儿古德仁和“养子”格哈德的“童年日记”，以及战后她妹妹莉迪亚·波登保管的一些纪念品；1934年以后，莉迪亚就一直和希姆莱夫妇住在格蒙德镇，他俩去柏林的时候，就由她照顾孩子。玛佳所记的“童年日记”结束于1936年；而她从1937年开始的私人日记，使我们对她崭新的社交生活有所了解——这种生活是因她丈夫的平步青云而得来，而她也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她经常邀请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们喝下午茶、打桥牌，或者应邀出席他人的晚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从日记中获知的仅仅是一些纯粹的事件：某人出席了某个活动，或者，最多看到一句“真好”。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以及玛佳那小布尔乔亚的狭隘思路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因接近最高权力而产生的自豪感（“能和元首安安静静地谈话真好”）、对自己理所当然成为新精英阶层一分子的坚信不疑（“我坚信在阳光下赢得了自己的位子”）以及对无情迫害“德国的敌人”的双手赞同。比如，她在谈到“懒惰”的佣人时这样说：“为什么不把这些入关进大牢，强迫他们劳动到死？”而1938年11月9日的排犹事件<sup>①</sup>发生之后，她则不耐烦地写道：“又是犹太人闹事！那帮人什么时候能放过我们，让我们好好过日子？”

☆☆☆

二战期间，希姆莱几乎不在柏林或慕尼黑居住，而是和其他纳粹领

---

<sup>①</sup>即“水晶之夜”。1938年11月7日，一名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在巴黎遭一名波兰裔犹太人暗杀。11月9日夜，在德国政府的一手策划下，成千上万纳粹分子、冲锋队员、希特勒青年团员涌上慕尼黑街头，对犹太人商店和教堂大肆打砸，造成近百名犹太人死亡，上百间犹太教堂和7500多家犹太人商店被砸。因被打碎的犹太人商店的玻璃，在月光下宛若水晶，闪闪发光，因此史称这一排犹事件为“水晶之夜”。——译者注

领导人一样，基本上住在火车专列上，不断往返于各个变化的战争舞台之间，而列车则是他的司令部。1940年春，西线战役期间，他坐专列东奔西跑了整整两个月，不过那一年剩下的时间，他还是在柏林度过的；然而，德国对苏联发动毁灭性战争之后，作为流动战役指挥部的专列，便彻底成为希姆莱的工作场所。早在1941年6月对苏联进攻开始后的几天，他就把自己位于东普鲁士安格堡——希特勒的“狼巢”也在那里——的司令部搬进了火车。1942年年中，希特勒把他的指挥部安置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同时又在日托米尔设立了另一个战役指挥中心，代号为“禁伐的森林”。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希姆莱不时短暂地回到柏林和慕尼黑，但他常住的地方，毫无疑问是在东部。

二战开始后，玛佳重操护士的旧业；此后她在柏林工作了好几个星期，她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护士这个女性化且没有政治倾向的工作根本不能满足她，作为德国红十字会的“高级领导”，她还对很多战地医院进行视察。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她除了和德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往返于欧洲被占领的国家，了解德国士兵的补给情况，还考察在外国的德国人的迁移情况，而这恰好是她丈夫当时主持的工作。

希姆莱夫妇从1941年起的书信往来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但1942年以后的书信，却只剩下了希姆莱一个人的，不过他在这些信中经常提到妻子的来信。此外，战争期间，希姆莱每隔两三天就会打电话给住在格蒙德镇的女儿“布娃娃”，而当玛佳住在柏林的时候，他更是每天给她打电话。

一些研究者认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家庭很早就出现了裂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希姆莱远非只和住在格蒙德镇的女儿古德仁一个人联系。其他一些补充书信和文件也表明，希姆莱夫妇都主张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波兰鬼”，“无法形容的垃圾”），都盲目崇拜希特勒、对战争充满热情（“战争进展得非常好。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元首”）。另外，希姆莱

非常关心玛佳的身体，要她读他的演讲，而且认为这很重要，还给她邮寄糖果甜食；而玛佳也经常托人，把她亲手制作的蛋糕送到东部前线的丈夫所在地。当然，玛佳在红十字会的工作经常是夫妻俩吵架原因，因为希姆莱更希望妻子留在格蒙德镇照顾女儿；但她却坚持己见：“战争期间，我不能待在家里而不外出工作。”

1938年圣诞节期间，希姆莱和他的私人女秘书海德温·波哈斯特开始了地下恋情，后者比他小12岁，还为他在战时生了两个孩子。但即便如此，希姆莱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未曾改变。尽管从1940年起，玛佳就开始抱怨丈夫“晚上不再回家”；尽管1942年以后，他写给她的信常常是由为她送礼物的副官捎带过来，而且都是匆匆写就、寥寥数笔；但是，他的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不仅为女儿、同样也为妻子买糖果、鲜花，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比如当时非常紧俏的各式纸张。他仍然觉得与第一个家庭的关系很紧密，比如，1944年，他为自己第一次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而倍感遗憾；再如，他和妻子女儿约定，分别在柏林的指挥部和格蒙德镇的家同时点亮冬至日彩灯，以“相互思念”，加深爱戴。

希姆莱的工作记事本和随身记事本，都提到他多次短暂回到格蒙德镇和柏林，这说明在战争期间，他见古德仁和玛佳的次数，并不比见海德温·波哈斯特和他们的孩子的次数少。后者起先住在勃兰登堡州的霍亨林青党卫队医院附近，后来搬到了离贝希特斯加登不远的舍瑙镇。1939至1940年，希姆莱决定和海德温·波哈斯特再生几个孩子——那时候，他颁布了《关于生育孩子的命令》，公开为生育私生子和重婚辩护，称重婚为“和平婚姻”，但权利都应归第一个妻子所有。希姆莱依靠职务和战争之便，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他在党卫队大肆宣扬的双重家庭概念。他在表白爱情时一本正经，感情贫乏，这在他写给玛佳的第一批信件中就早已昭然若揭，现在又再次反映在他给海德温·波哈斯特一封信中。这封被保存下来的信，不仅在内容和风格上酷似希姆莱早期写给玛

佳的信，而且信末用语也和他 16 年前给妻子的一模一样：“吻你珍贵美丽的双手，还有你温柔的嘴唇。”

玛佳不同于纳粹朋友圈里的其他妻子们——比如盖尔达·鲍曼，她受不了“第二夫人”的存在。但关于这个主题，她仅仅婉转地表达了愤懑之情（“我无法记录战争以外的任何事情”）。由于她和海因里希一样，深受纳粹思想的浸润——也就是说，“为了德国”，必须尽快生育更多的儿子——所以她很难对丈夫的决定提出异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无疑是对她的侮辱——不仅因为她视不忠为对家庭的背叛，而且因为由于女儿难产，她本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在给妻子的信中，希姆莱在战争期间血腥的日常生活只被含糊其辞地提及（“战斗非常艰苦，包括——或者说尤其——对于党卫队而言”）。他一如既往地喜欢强调自己工作的繁忙和沉重（“工作多如牛毛”），并经常寄来一些他在东部前线做闪电式旅行时拍摄的无足轻重的照片（“随信寄去我最近在卢布林、伦贝格、杜布诺、罗夫诺、卢茨克出差时拍的几张照片”）。只有了解历史背景的人才会知道，希姆莱在信中提到的这些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实施对被占领地区的殖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原住民驱逐和转移计划（“在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旅行非常重要；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同样也是为了定期视察党卫队部队的驻地——在对苏联的进攻开始之后，这些部队便立刻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我去考那斯、里加、维尔纽斯、米托、杜纳堡、明斯克一带出了一次差”）——或者是为了前往那些于 1941 至 1942 年间设立起来的灭绝集中营（“未来几天，我将会去卢布林、扎莫希奇、奥斯维辛、伦贝格”）。

战争的最后一年，希姆莱不但是内政部长，还担任着预备军总司令、集团军司令官等职务，他经常向妻子抱怨肩上日益“沉重”、不断增大的职责。但是，在玛佳面前，他自始至终显出开心、乐观、渴望行动的样子，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患有慢性胃病——但他“忘我地”承担着愈发沉重的工作，认为这是他“为德国人民服务”应尽的责任。海

因里希·希姆莱日渐扩大的权力，让他妻子非常自豪，这也反映在她的日记里（“他被赋予如此重大的职责，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真是太光荣了”）。

随着古德仁逐渐长大，她的日记也越来越多地提到父亲“从不倦怠的热情”，以及他工作的“分量”：“全德国的人民都看着他。他总是默默无闻地留在幕后，从不抛头露面。”很明显，父亲肩上“重大的责任”并不只是母女之间的话题，也是父女两人电话中经常谈起的事情。在古德仁眼里，父亲长期不在身边给她带来的悲愁，反而使他越来越成为一名遥远的英雄——她为他自豪，也为自己是“这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女儿”而自豪；然而，她其实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所知。

在希姆莱一家小布尔乔亚的温情外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暴力和冷酷。这种暴力和冷酷，一方面归因于海因里希·玛佳，以及他们那一代所有人都深受其害的“黑色教育”和严格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将生活中任何方面的暴力、冷酷和无情都视为至上的美德。因为对自己冷酷，所以对他人——包括对自己的孩子——同样地冷酷就是合情合理的。

具体到古德仁身上，这种暴力和冷酷极其清晰地体现在玛佳为女儿早年所记的日记之中：有关清洁的严格教育、不听话时父母的痛打、海因里希在年幼女儿面前所表现出的严肃（“相比我而言，她更听她亲爱的爸爸的话”）。当4岁的“养子”格哈德来到他们家时，玛佳希望他能对三岁的女儿起到一些好的影响：“小男孩非常听话，但愿布娃娃很快就能学会和他一样。”

然而，小男孩所谓的听话让她头几天所感觉到的热情不久就烟消云散了：他干尽坏事，经常令养父养母、学校老师以及其他的人憎恶。相反，小时候的古德仁经常恳求母亲不要告诉爸爸她“犯过事了”，而现在，她却以日益完美的方式，显而易见地满足着人们寄托在她身上的希望。虽然她经常生病，学习成绩也很差，但从另一面来看，她父母对她

非常骄傲，因为“布娃娃”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做罐头、为前线的士兵做礼物、阅读正统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父亲装在包裹里，定期寄给妻子和女儿的。

希姆莱夫妇对“养子”格哈德的态度则远远没有那么客气，甚至随着后者渐渐长大而变得更加严厉——似乎他们希望将这个男孩培养成未来的战士。在一些补充文件、以及格哈德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多年来他一直害怕希姆莱回到格蒙德镇，因为后者经常会对他施以暴打作为惩罚——但这也不妨碍他有时会和小男孩一起去安安静静地钓鱼，就像格哈德回忆的那样：“他也可以是一个正常的父亲。”在玛佳看来，格哈德没有任何优点（“他撒起慌来无法形容”），说这个10岁的男孩“天生就是罪犯”。最后，希姆莱建议妻子在给“养子”的信中，不再落款“妈妈”——“等到他有所改进的时候”，她再恢复以前的落款。战争结束前不久，希姆莱把当时16岁的格哈德送到一个装甲师参加党卫队的训练，这使后者第一次获得了玛佳的赞许（“他很勇敢，在党卫队干得非常好”）。

因此，在私人书信中，希姆莱不仅是贤夫慈父，也是一个无情的纳粹领导，在这一点上，他自始至终都和妻子是一致的。他俩对两个孩子抱有极大的期望，特别是对“养子”，因为他将是未来的战士。孩子们必须遵守服从的规则，一旦有过失行为，就会遭到惩罚，甚至得不到父母之爱——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暴力，毫无疑问，它在情感上造成的破坏效果，丝毫不亚于痛打。

☆☆☆

这些私人信件，让我们看到一个为信仰而犯罪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他根本不需要将自己的人格一分为二。在他作为党卫队领袖和种族灭绝政策实施者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他不作任何区分，



也不试图对大屠杀作任何掩盖。他也不因此而在妻子面前炫耀：他把这种屠杀看作国家赋予他的不可或缺的使命，他必须认真尽责地完成。

他在信中没有流露出丝毫怀疑和后悔，他本可以为此向妻子忏悔。相反，他坚信后者完全赞同他行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玛佳从一开始就支持他的反犹和种族主义思想，纳粹上台后，她更是同意将共产党人、犹太人和“不适应社会的人”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群体”中排斥出去。对犹太人的迫害从驱逐到有组织地杀害，变得越来越极端，即使她丈夫不直接告诉她，玛佳对此也不可能一无所知，因为她非常接近纳粹权力层。但在她的信件和私人文字中，我们看不到她对这种行为合理性的任何怀疑。

这些文字反映的并非是“罪恶的平庸性”。希姆莱从来就不是汉娜·阿伦特<sup>①</sup>所分析的那个阿道夫·艾希曼：后者被她错误地认为是根据分工原则运作的集权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个没有能力承担其行为后果的人。而希姆莱的行为是他自己想要完成的，而且他希望完成得一丝不苟、值得信赖、中规中矩。

“当一百具，五百具，一千具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面前时，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此时此刻，庄重和得体——除非因异乎寻常的人性弱点而失态——会使我们变得冷酷。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一页过去从来未曾书写过，将来也永远不应该再被书写。”这就是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所做的著名演讲。他是怀着道德和自信从事种族屠杀的，这种道德和自信同他年轻时代——当他关注兄弟和朋友们的生活方式时，当他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当他在信中表示他知道妻子赞同他时——所表现出的一模一样。拉斐尔·格罗斯<sup>②</sup>和维尔纳·考尼策<sup>③</sup>不无道理地指出：希姆莱把大屠杀看做必须、并且认为可

---

<sup>①</sup>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犹太人，原籍德国，美国政治理论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译者注

<sup>②</sup>拉斐尔·格罗斯(Raphael Gross, 1966-)，瑞士历史学家。——译者注

<sup>③</sup>维尔纳·考尼策(Werner Konitzer)德国法兰克福弗里茨堡学院教授。——译者注